

本 卷 导 论

一 二三十年代中国政治

本卷所介绍的是五四运动以后至 1937 年 7 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期间的中国社会思潮。这一阶段经历了通常所指的五四运动、第二次护法之役、大革命(北伐战争)和十年内战(土地革命)时期 按时序分界,以 1927 年大革命失败为标志,也可分为前八年和后十年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之初,中国大地上仍沿续五四之前的政治格局,政坛上存在两大势力: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1914 年反袁护国时一度改称中华革命党)活跃于南方(主要是两广)一隅;广大的华中、华北、东北及北京政府一直控制在北洋军阀手里。

孙中山在领导第一次护法之役失败后,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为让新改组的党能找到立足点,1920 年乘广东发生滇、桂两系军阀武装冲突之机,联系滇系,将桂系逐出广东。1921 年 5 月中华民国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孙中山当选为非常大总统,与北京政府对抗。为巩固南方基地,孙中山发动粤桂战争,桂系惨败,广州政府实现了两广统一。为培养一支忠于国民党的军队,他支持粤军陈炯明,让陈出任广东省省长。孙中山念念不忘北伐,特在桂林建北伐大本营,并于 1922 年 2 月举行了北伐誓师典礼。但陈炯明自恃羽翼已丰,勾结北洋军阀发动政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在永丰舰上调动北伐军回师讨伐陈炯明,战斗失利,孙中山又一

次离开广州。

陈炯明的背叛并导致第二次护法之役失败，给孙中山沉重打击，然而这次失败却促使了孙中山思想上的重大转变。

孙中山的转变，离不开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的发展。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孙中山关注这场革命，曾致电列宁表示祝贺，萌发了“以俄为师”的思想。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更使他产生了“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①他的目光进一步转向民众。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直系与皖系，稍后张作霖纠合东北新旧军形成奉系。除三系外还有一些小派系。北洋军阀控制北京中央政府，名义上是全中国的代表，实际上则投靠不同的帝国主义，充当他们在华利益的代表。

从1916年6月到1920年7月的4年间，皖系军阀一直控制北京政府，皖系头子段祺瑞扩大势力，排除异己，引起直系吴佩孚、曹锟的不满。他们暗中与张作霖及西南军阀联络，建立反皖联盟。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战争中直、奉两系协同作战，皖系战败，交出了政权。日本帝国主义本是皖系、奉系后台，皖系失败后，便支持奉系与以英、美为后台的直系争夺中央政府控制权。1922年4月底，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系大败，退回关外，直系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直系军阀内部为争夺组阁权，分化为洛派（吴派）和保派（曹派），引起多次内阁危机。曹锟急于爬上总统宝座，1923年6月发动癸亥政变，10月在金钱利诱和武力威逼下当上大总统。所以在孙中山屡遭挫折同时，北方政局是“你方唱罢，我又登场”，战乱不已。那么中国的希望在哪里？

诞生于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希望所在。五四运动推

^①孙中山：《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0页。

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 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①。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 1922 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民主联合战线”的方针，明确主张与孙中山建立反帝反封建联合战线。经过共产国际帮助，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建议，开始了国民党改组工作。1923 年孙中山策动驻粤各军驱逐了陈炯明，抛弃了护法这面旧旗，国民党改组工作从上海搬到广州。1924 年 1 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发表了《改组宣言》，公布了新的《党纲》草案，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新三民主义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内容，它与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阶段纲领基本一致，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代表大会承认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选出了有共产党员参加的中央领导机关，从而使国民党转变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联盟。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国共合作和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推动了国民革命的高涨。在中国共产党的苏联支持援助下，孙中山开办了黄埔军校，对旧军队进行了改造，全国工农运动蓬勃高涨。1924 年 9 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宣布停战，将自己军队改称国民军，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统一大计。孙中山毅然接受邀请，他发表宣言，对内主张召开国民会议，结束军阀混战，对外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得到全国人民拥护。不幸，孙中山因积劳成疾，于 1925 年 3 月 12 日在北京逝世。

全国革命形势继续高涨，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显示了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1925 年 7 月 1 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成

^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700 页。

立，接着国民革命军组成，两广根据地统一，为北伐创造了有利条件。

北京政变后，窃取北京政权的段祺瑞和张作霖勾结，排挤冯玉祥，积极投靠帝国主义，血腥屠杀爱国学生。4月，冯玉祥部下驱逐段祺瑞，北京落入奉系军阀手中。这时北方军阀以奉系势力最大，其次是直系吴佩孚和孙传芳，国民革命军北伐主要打击的便是这三支力量。

1926年6月5日，国民党中央通过出师北伐案，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北伐战争开始。

由于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深得人心，北伐战争获得全国民众广泛支持；也由于国民革命军中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的模范作用；加上沿途工农群众的支援和苏联帮助，北伐军势如破竹，内部矛盾重重的北洋各系纷纷瓦解，半年内就消灭了吴佩孚和孙传芳主力，将革命从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国民政府也迁至武汉办公。

国共合作建立，并不意味着统一战线内风平浪静，国民党右派一直反对国共合作，孙中山逝世后更不断制造事端，西山会议派的出现，中山舰事件发生，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整理党务案》的提出，矛头都指向共产党，但由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北伐还是取得了胜利。武汉政府依靠广大群众支持还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

北伐的胜利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军阀、买办势力不安，他们采用收买国民党内右派的办法破坏革命，蒋介石便是他们看中的对象，而蒋本人早就企图反共，通过江浙财阀牵线，蒋介石与帝国主义建立直接联系。他密令所控制的沪宁一带取消“打倒帝国主义”口号1927年4月12日正式解除上海工人武装，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以此为信号，广州、南京、杭州、福州、厦门、

重庆等地都发生类似事件。奉系军阀也遥相呼应，在北京捕杀了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和革命左派。但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控制的武汉和两湖地区，革命仍向前发展，一度形成宁汉对峙局面。为时不久，武汉政府中汪精卫等急速右转，共产党内因陈独秀的右倾而步步退让，放弃了革命领导权，导致了宁汉合流。7月15日，汪精卫不顾国民党内左派宋庆龄、邓演达等的反对，悍然决定“分共”，向革命群众和共产党人举起屠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

1927至1937年10年间，总的历史线索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但地方实力派和中央派系间斗争频繁，内战不断；共产党由公开转入地下，从城市转向农村，逐渐在全国建立了十几个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南京政府不断对根据地进行“围剿”，形成长达10年的国共对立。抗日战争爆发，经过西安事变，国共两党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又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1928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开始了“第二次北伐”，孙传芳残部和张宗昌“安国军”节节溃退，担任北京军政府大元帅的张作霖眼看大势已去，6月发表“出关通电”，放弃北京，退回东北，途中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北伐军顺利接收华北。统率东北军的张学良不顾日本压力，宣布东北易帜，年底易帜完成，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形式上达到了全国统一。

东北易帜后，蒋介石集全国党、政、军权于一身，不满意地方实力派拥有地盘和军队，当时全国势力最大的地方实力派当推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1929年召开的“编遣会议”，即是以裁军为名达到削弱地方实力派的目的。双方矛盾不可调和，终于导致了蒋与冯、阎、桂各系之间的混战。1929年3月为争两湖，爆发了蒋桂战争，桂系失败，蒋军占领两湖大部地区。5月，冯玉祥发动倒蒋，因部下被收买，冯通电下野。12月，粤系张发奎联合桂系，以“护党救国”为旗帜进攻广东，同时驻河南的唐生智也参加，被蒋各

个击破。1930年4月至11月阎、冯、桂各系达成协议，共同组成反蒋联盟，发动规模更大的中原大战，蒋死死拉住张学良，张学良出兵关内，战局急变，阎、冯下野，桂系退回广西，蒋介石大获全胜。

国民党内部派系众多，西山会议派、改组派（汪精卫为首）、政学系等或联系地方实力集团，或结合失意政客，争权夺利，不断发生政潮、党潮。

共产党方面“七·一五”以后，为挽救革命，中共召开“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总方针。在这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1927年9月，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后的工农革命军走向井冈山，开始了中国革命走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在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指导下，中共在全国建立了十几块根据地，遍及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河南、安徽、浙江等省。至1930年，各地红军已发展到10万人，根据地内广泛开展了土地革命。

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引起南京国民政府的恐惧不安。1930年底蒋介石发动了对根据地的“围剿”，至1933年，一共发动了五次。前四次“围剿”，根据地按照毛泽东战略方针，蒋军均告失利，中央根据地反得到发展，1933年全国红军已有30万人。1933年10月开始的第五次“围剿”，由于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左”倾机会主义掌握苏区领导权，红军遭到惨重损失，不得不走上长征之路。1935年1月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核心，为长征胜利和革命新局面的打开奠定了基础。之后又粉碎了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冲破了蒋介石和地方军阀重重围堵，红军终于胜利到达陕北。

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方针下，国民党用大部分兵力对付

共产党和红军，反之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阴谋和行动一再忍让。1931年9月18日，日本挑起‘九·一八’事变，占领了沈阳，东北军执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撤入关内，至1932年1月，东北全境沦陷。1932年1月28日，日军又向上海中国驻军发动进攻，中国驻军奋起抗击，这就是‘一·二八’抗战。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疯狂举动，激起全国抗日浪潮兴起，中国共产党、中间派人士、国民党爱国将领以及工人、农民、学生、商人各阶层，或发表声明，或以实际行动纷纷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适时调整了各项政策，并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国共重新合作创造了前提。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基本确定了停止内战和国共合作原则，在对日问题上，提出了如果让步‘超过忍耐之限度，而决然出于抗战’，^①第一次在文件上出现了“抗战”。这表明国民党已事实上改变10年来的错误政策，由内战和对日不抵抗，向着和平和抗日的方向转变，从而标志着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7月7日，驻丰台日军向中国驻军发动攻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毛泽东曾说：“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芦沟桥中国军队的抗战，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②从此，历史转入了中华民族浴血抵御日本侵略者的抗日战争时期。

^①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宣言》，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28页。

^② 毛泽东：《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2页。

二 经济变化与阶级变化

五四前后,是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英、法、德、俄都卷入了战争,不得不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这些国家忙于军火生产,无暇顾及轻工业,过去依赖上述国家工业产品的地区不能得到充分供给;同时参战国本身轻工业产品也极为匮乏,这就客观上为中国某些轻工产品进入世界市场创造了机遇。

这时期中国近代工业发展还得益于银价上涨。1913年墨西哥银矿关闭,国际银价一路上扬。中国货币是以银为本位的,以是购买力提高了3倍。货币升值并未抵消世界市场对中国轻工产品需求,中国外债反因此减轻,工业家们更乐意采购设备扩大生产。

1919至1922年间,中国工业界充满乐观气氛。以纺织、面粉加工业为例,中国民营纺纱厂1915年只有15家,1922年增至64家,纱锭在1915年只有544,010枚,1922年增至1,506,634枚^①;面粉厂在1911年全国只有22家,至1921年猛增至117家,资本总额达1500万元^②。华资面粉厂大量兴起,改变了面粉入超状况,从1915年起面粉即出超5.7952万担,1920年出超增至344.9358万担。除棉纺、面粉外,榨油、卷烟、火柴、造纸、肥皂、制革、玻璃等轻工业都有较大发展。轻工业的发展带动了机器制造、采矿业发展。一些原有的手工作坊也改用机器或半机械生产,比较明显的是华北、华中各省织布机有显著增长。

①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65—166页。

②杨大金：《现代中国实业志》（上），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630页。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为期很短，即使在很短期间内，未被大战卷入的日、美资本主义都乘机加大对中国的资本与商品输出。如日本在华所设纱厂的锭数 1913 年为 111936 枚，1922 年便增至 621828 枚，9 年中增加近 5 倍。织布机数在同样年份增加两倍半。^① 美中贸易额原来份额很小，1919—1921 年已占中国对外贸易的 17.6%，居外国对华贸易的第三位。^② 老牌帝国主义中只有英国还维持它的地位。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都壮大许多。工人总数从战前 100 万增至 260 万(含外资工厂工人)，这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马克思主义传播提供了阶级基础。中国资产阶级经济实力扩展，使得各地商会、议会中涌现出一批代表人物(西方称之为“城市精英”)，二三十年代中国改良思潮盛行并衍生出各种流派，就是以此作为背景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卷土重来，加紧了对中国经济侵略，体现在(1)对华商品输出迅速增加。中国人口贸易如以 1913 年总值指数为 100，1919 年为 113.6，1924 年便猛增至 178.6。^③ (2)资本输出中，数量最大的是英、日、美三国，除投资企业外，金融资本在华急剧膨胀。一项统计表明，1895 年至 1920 年各帝国主义在华开办企业 56 家，平均每年 2 家，到 1921—1930 年开办的企业 54 家，平均每年 5 家，速度增加 1 倍多。其中日资企业增长速度最快。金融资本对华输出势头更猛，1914 年前，各国在华共有 9 个总行，1914—1926 年间却有 16 个总行、50 个分支行(日资银行未计算在内)^④ 这些银行给政府政治贷款，投

①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 174 页。

②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 年版，第 65 页。

③ 杨端六、侯厚培编：《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 2 页，第 2 表。

④ 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56 年版，39—40 页。

资铁路矿山,发行纸币,吸收存款,独占外汇,从而控制了中国金融和财政。

中国民族资本在帝国主义进逼面前,市场日益缩小,利润下降甚至亏损。大战中最看好的面粉业,1922年前曾维持7年出超,1922年起又变出超为入超,1923年入超达582.645万担,^①不仅失去海外市场,国内市场也被洋面粉占领。纺织业一度是发展最快行业,1919年每出一包纱利润达70.56元,1921年降至10.21元,1922年每包纱竟亏损20.63元。^②许多华资工厂被日、美厂兼并或租赁,即使勉强维持也只能缩小规模,不时停工停产。

1928年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并未改变这一趋势。1929年爆发了世界性经济危机,各资本主义国家更加强了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掠夺。中国自然是他们转嫁危机的主要对象。

1928—1931年间,各帝国主义国家向中国商品倾销达到空前程度,1928年前中国每年入超平均在3亿元内,1929年入超增至38,900万元,1931年更猛增至81,600万元。大量入超造成白银外流,这时世界银价跌落,中国在外贸上损失更巨。

外资对中国工业更形成垄断局面。1928年上海全市工业投资总额3亿元中,外资占2亿元。重工业中,如采煤,仅日本垄断的抚顺煤矿、英国控制的开滦煤矿,1931年产煤量即占全国的50%。其他如生铁产品的95%,石油工业的99%都为外国资本控制。外国资本在交通运输业上的控制也十分惊人。1931年由外国经营或控制的铁路里程占全国铁路总里程的84.3%。航运业,外国轮船占了轮船总吨位的82.8%。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日起,经济领域最引人注目的是官僚资本的出现和壮大。国民政府为应付庞大军费开支,从1927年起便

①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74页。

②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65页。

大肆发行公债 5 年间发行公债 25 种,总金额达 10 亿多,超过北洋军阀 15 年发行公债总量。所有发行的公债都由金融机构承购,也即是由政府出面,按公债面额 7 成、6 成、5 成押给银行,而偿还却按票面十足支付,另要付息,使银行和官僚从中攫取高额利润。通过高利引诱,部分银行家投入国民政府怀抱,不少人还当上官员,扩大了官僚资本阵营。国民政府为控制全国金融,1928 年建立中央银行,第一任总裁是宋子文,接着是孔祥熙,他们同时又是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官僚资本还利用各种手段控制了历史悠久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又创办了一些其他银行和金融机构,通过它们,以‘官股’形式加入民营企业,使民营变‘国有’,或以自己的商股加入国营企业,控制这些企业为私有。宋子文、孔祥熙同时都是著名企业的大股东或老板。

在帝国主义和具有政治特权的官僚资本双重压迫下,民族资本前景更为暗淡。据国民政府实业部 1928 年和 1931 年注册工厂数作一比较:1928 年工厂实数 250 个,指数以 100 计,到 1931 年工厂实数为 113 个,指数降至 45.2。资本额下降幅度更惊人,1928 年资本实数为 1.17 亿元,指数以 100 计,1931 年资本实数降至 0.277 亿元,指数只是 23.5,显示了民族资本的日益萎缩。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统一整顿全国财政、金融、增加政府收入上曾做过一些工作。

首先实行了关税自主。中国的关税从清末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后,进出口税率限制在 5%,海关又控制在外国人手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包括北京政府在内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直为争取关税自主(自定税率、自主任命海关高级官员)而斗争,但遭到帝国主义各国一再抵制。南京政府与列强各国进行漫长的谈判,至 1930 年 5 月才最终实现关税自主,颁布了《海关进口新税则》,进口关税率 1929 年为 4%,1930 年提高到 10%,1935 年达 25%。关税收入大为增加,1928—1929 年度关税收入为 1.79 亿

元,1931—1932年度增至3.57亿元。^①

其次,对国内税收改制。国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废除扰民扰商最甚的厘金,将若干杂税改为“统税”,规定统一税率,避免了各地随意设卡征税,有利于商品流通。又将盐税收缴归中央,盐税收入从1928—1929年度的0.3亿元增至抗战前(1936—1937)的1.97亿元。^②

再次,实行废两改元,统一货币。1933年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废两改元。1935年以外汇储备为支持,采用现代纸币制度;同年宣布白银收归国有,禁止作货币使用,中央、中国、交通银行发行的纸币成为法定支付货币。币制改革,防止了白银外流,对稳定全国财政金融起了良好作用。

但直至抗战爆发,国民政府也没有有效地控制某些省份如山西、云南的财政收入。为了换取各省支持,在1928年6月举行的全国财政会议上,田赋正式让给地方。因此这时中央财政规模并不大,庞大的军费开支只能依赖发行公债来支持。军费及借款、赔款的还本付息占了财政支出的70—80%左右,政府用来发展生产的支出是极其有限的。

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并未给国内民族工业带来益处,进口税增加,使民族工业所需进口原料、设备的成本大增,加因世界经济危机波及,1932—1935年,形成全国性工商业萧条。在一再呼吁下,1935年成立了工商业救济贷款委员会,大约分配了2000万元贷款。官僚资本乘机通过银行控制困难企业,仅中国银行一家便控制了大约15家纱厂。^③

^①参见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页所列表。

^②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121页所列表。

^③ 参见《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917页。

1935 年日本占领东北后，进一步鲸吞华北的野心日益暴露。南京政府从国防考虑，发起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五全”大会后，国民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增设了全国国民经济计划委员会，蒋介石任会长，负责设计、指导、监督全国国民经济建设。从 1935 年到 1937 年抗战全面爆发，是国民政府时期各项建设发展最快的几年。

工业上，以开发重工业和建设大工业为重点。1935 年南京国民政府将原国防设计委员会改为资源委员会，负责全国重工业和国防工矿资源调查和开发。1936 年国民政府特拨款 1000 万元作兴建工矿企业之用，资源委员会既对我国具有战略意义的矿产锑和钨进行统制，并分别在湖南和江西建冶炼厂；为解决燃料不足，在西北建立了酒精厂；其他还兴办了一些铁矿、铜矿和钢铁厂。

交通运输方面，1932 年后国民政府虽有修筑粤汉、浙赣、陇海等铁路计划，但进展缓慢，仅筑路 1763 公里。1935 年底后加快速度，至抗战爆发前共完成铁路 2030 公里，是 1927 年到 1935 年八年半时间筑路速度的 65 倍。公路建设主要铺筑各省间联络公路，并注重西南和西北的公路建设，至‘七七’事变前，中国公路里程已达 10 万余公里。

一向被忽视的农村经济，国民政府在 30 年代也开始给予一定关注，主要是发展合作社，并建立中国农民银行，向农村发放贷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1936 年，又值风调雨顺，全国粮食丰收，由于通货膨胀影响，农产品价格上涨，农民实际收入有所上升。

国民政府的经济措施，最大受益者尽管不是农民和工商业者，但仍对全面抗战的到来起了积极支撑作用。

三 二三十年代社会思潮的特点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与剧烈的近代社会变革密不可分，各个历史阶段的阶级变化、政派消长、文化冲突都能在同一时期社会思潮中得到反映。二三十年代的社会思潮同样折射了这个时代经济、政治和文化各方面的面貌。

研究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思潮，至少可以概括出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思潮，可以说是整个近代中国社会思潮最丰富、最多变幻的时期。众多思潮出现，与这时期阶级力量的变动有关。

二三十年代民族资本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力量的增长，造成反映这个阶级利益和要求的改良思潮极为活跃。民族资本发展和帝国主义在华企业增多，也使工人阶级人数剧增，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落地生根提供了社会条件。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逐步结合，新民主主义思潮酝酿到初步形成，都在这一时期，绝非偶然。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既是剥削者同时又身受外国列强与国内军阀、官僚压迫，这个处境决定它既有反帝反封建的愿望，又割不断与它们的联系，总的来说中国资产阶级很软弱。二三十年代的改良思潮不同程度地表达了资产阶级对军阀和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和对民主法制的企望，但又不愿与之决裂，更不愿现存制度的瓦解，这股思潮的尴尬处境，正与所代表的阶级地位完全符合。

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能自发产生。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探索自己祖国应

走什么道路上历经曲折。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陈独秀、李大钊和毛泽东都作出了贡献,特别是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正确回答了中国各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克服党内右倾,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光辉范例。它指出了以农村为根据地,最终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在革命处于低潮形势下,新民主主义思潮显得不那么眩目,但它理论上的正确和实践上的不断丰富完善,已预示了它必将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工人阶级的壮大和中国共产党生机勃勃地出现于中国政治舞台,还促进了孙中山对三民主义进行改造。经过重新解释的新三民主义包含了反帝、反军阀、国家政权为一般平民共有、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等内容,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大革命的胜利是国共合作的胜利,也是新三民主义的胜利。

第二,二三十年代林林总总的中国社会思潮是在五四运动这个历史大背景下产生的,不能忽视五四思想解放潮流对这一时期社会思潮的影响。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功绩之一便是进一步冲决了封建思想的禁锢,为西方各种新思潮的传入开辟了道路。二三十年代上承五四运动,新思潮的传播更显丰富多彩。这时期不仅马克思主义日益显示了它的生命力,西方其他思想如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的唯心论也极有市场,杜威的实验主义风靡一时,连西方最新哲学流派如新实在论、层创进化论等都流入中国。二三十年代是中国近代教育迅速发展时期,各类大、中学校大批兴办,形成了比五四前更壮阔的知识分子群体,加以留学生纷纷归国,他们当教授、办杂志,不仅是西方各种思想的传播者,更是新思潮中的风云人物,因此这时社会思潮的领袖、载体和群众都呈现了与往昔不同的声势和风貌。

西方思想的传入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简单移植。思想领袖们首先是为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而从西方思想武库中寻找武器

的，这在中国思潮与西方源头之间产生了不少差距。这种思想的异化和民族化几乎到处可见，但与中国实际结合的成功与否，各种思想的表现却是各不相同的。西方思想既是一种武器，思想领袖们的取舍也就见仁见智，因此中国某种思潮常常不是一种西方思想的翻版，导根溯源，常可发现是几种西方思想的综合或糅合。用这时期中国思潮来套西方思想框架，便会有削足适履之感。因此我们没有采用诸如人道主义、唯意志论、自由主义、激进主义来作界别，而大体用思想领袖们自己的抒发和主张进行区分。

这时期，西方思想的信奉者中不乏主张全盘西化、排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人；而某些西方思想文化在它的故土，随着时代前进，缺点日益暴露，于是在思想文化界出现了固守东方文化为职志的保守思潮，二者就东西文化孰优孰劣，哪种文化更适合中国需要等问题展开论驳，形成著名的中西文化论战。在各种新思潮间，为解决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中国革命动力和归宿问题也展开了论战。文化思潮和论战包含了政治的内核，这一点毫不足怪；难得的是这时文化思潮和论战，从内容到形式与五四时期的思潮有颇具相似之处。就内容言，中西文化论战所争论的问题，五四时新旧思潮激战时就已提出，不难看出两者间的沿续和发展；形式上，这时的论战形式也与五四时问题与主义之争、各种社会主义论战相仿佛，五四的影响确不能低估。

第三，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思潮门类繁多，主张各异，但都在为中国寻找出路，思潮的政治色彩浓厚；各种思潮不仅反映不同阶级的意志，更反映了相异的政派需要。

中国近代社会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错综交织，中华民族的命运牵动着每个中国人的心，建立独立富强现代化的国家是全民族的崇高愿望。各种思潮的领袖在构筑自己思想体系、阐述自己主张时，都从不同立场和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各种政治派别也推出自己的代言人，向民众宣传建立现代国家的看法。如不这样，任何思

潮、政派就不能得到人们认同。

各种思潮与政派、政潮的结合，在二三十年代反映得极为突出。一些社会思潮一开始是作为一种政治主张提出的，如好人政府、联省自治、废督裁兵，但由于击中了人们普遍关注的政治热点，各政治派别、团体都发表自己看法而形成颇具声势的社会思潮。因此同一思潮中各个不同阶层和政治主张常有很大差异。以联省自治为例，一向标榜自由主义的派别积极参与，连地方军阀也打起“自治”旗号，为割据一方作辩解。再如三民主义，孙中山晚年将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符合了革命需要而获得极大成功，但就在创立三民主义同时，特别是孙中山逝世后，形形色色的三民主义纷纷出笼，其中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等都推出自己的“三民主义”，他们虽自称只有他们的三民主义才是“纯正的”、“科学的”，但都隐藏着国民党内部派别争权夺利的实质，思潮在这里已沦为政派斗争的武器。

思潮与政治紧密相联，使思潮本身发展很不充分，如果将它与西方思潮相比，会有更深切感受。西方思潮一般有深厚的哲学底蕴，它虽不排斥政治主张，但更考虑人在社会上的地位、作用，关注人本身的解放，因此西方思潮回答的不只是政治，而包括了经济、文化、社会、艺术等领域的问题。中国近代思潮虽很丰富，二三十年代尤多姿多态，但受政治影响，思潮领袖忙于解答中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而缺乏对西方本源思想的消化吸收，西方思想在他们那里常成为政治方案的一种依据和点缀，因此常出现这样的情况：随着政潮起伏，某一思潮代表在另一思潮中又重露头，而这两种思潮并不完全相同。

在对西方本源思想的消化吸收并与中国实际结合中，马克思主义显现了它与众不同的风采。新民主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的，它历经考验在抗战前夕初步形成，在众多思潮中独树一帜。